

---

# 新旧版《大波》与成都竹枝词<sup>\*1</sup>

谢天开

**【摘要】**:旧版《大波》中的成都竹枝词,不仅起到了文学修饰作用,而且呈现出浓郁地域特质。而新版《大波》却将其删裁,究其原因,其一因涉著者与事主的“笔墨官司”;其二著者与事主各自的社会场域亦发生了种种变化;其三在创作新版《大波》时,虽说著者经历了特定时期的“思想改造”,但因其长期创作所形成的文学书写习惯是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的。新版《大波》虽说作出一定的妥协,却成为一种探索性的历史小说叙事新文本。

**【关键词】**:《大波》;成都竹枝词;场域;书写习惯;新文本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04-0181-8

## 一、旧版《大波》中成都竹枝词的文本意义

在旧版《大波》中,共集中引用成都竹枝词二次。第一次出现在第二部分第十五节,14首;成都竹枝词第二次出现在《大波》(中卷)的第二部分第十八节,旧版《大波》在此处注明22首,实际上“原书仅载二十一首”。<sup>[1]</sup>

### (一) 旧版《大波》中的成都竹枝词

旧版《大波》以人物为中心,在相关章节引入成都竹枝词是作为历史小说的一种城市书写方式。成都竹枝词作为历史小说的文学修辞,主要功用如下:

#### 1. 人物家庭地位与社会角色的刻画

黄澜生站在堂屋内外檐阶上唤道:“子材,来看看这十几首竹枝词,倒还有味。你们四川人搞这些东西,倒还……。”

他太太也走出来道:“这才是老马不死旧性在啦!又是你们四川来了!”

“得亏夫人教训,下官以后再不敢了。”打着唱戏腔调,把大家都惹笑了。

楚子材将那用信纸抄的竹枝词接了过来道:“是那个做的?”

“说是无名氏,送来的是局上朋友的跟班,他自不晓得。”

黄太太道:“念来听听,看我懂得不?”<sup>[2]</sup>

---

<sup>1</sup>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开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6DFWH008)成果。

**作者简介**:谢天开,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1731。

---

在这段对话中，黄澜生“惧内”的家庭地位、黄太太强势的家庭地位，楚子材的晚辈兼与黄太太的暧昧关系地位，都通过成都竹枝词为题对话中表现出来了。

楚子材便打起念诗的调子念道：“川人始终归会办，须知恶果有原因：铜元旧账翻新案，惨杀股东会里人。——下面还有注子哩。川督前借铁路股本铸铜元，许利归公司，后乃攫入边藏，股东争之。”

黄澜生问他太太道：“懂不懂得？意思是说赵季鹤因为与铁路公司互争铜元余利，先结下生死冤家，这一次捉人，是报宿怨。”

楚子材道：“这件事，连我都不晓得。”

“你自然不晓得，这是光绪三十三年事。借股本四百万铸铜元，是赵尔巽赵次珊做总督时办的，那时赵季鹤正在做边务大臣，两弟兄的确有点勾结。不过股东们闹得并不厉害，这首竹枝词说得过火一点，赵季鹤何尝专为这件事，和铁路公司的人为难呢”<sup>[3]</sup>

这段对话，又将黄澜生作为官吏、对官场熟悉的社会角色；楚子材作为关心时局的学生角色；黄太太对外界知之甚少的家庭主妇角色一一刻画出来了。

## 2. 情节的推动，显示出政治经济事件的复杂性。

因为楚子材越念越大声，两个孩子便飞跑过来，一路叫道：“楚表哥在唱啥子？”

他们的妈妈连忙吆喝住道：“楚表哥在念诗，莫烦！好生听！”

“听说尸亲要领尸，强书匪字双泪垂：银元四十将何用，刑赏难分事太奇。——十五日枪毙之尸，领取认为匪者，给四十元，不认者怨办。毕竟先生在做文，连篇告示幻风云：倒填日月真堪笑，解说徒劳议论纷。组织犹嫌罪未真，又将统领蔑乡绅；就中有个逋逃者，首是滇南王采臣。——大帅称乱者举十大统领，中有王护院。又护院濒行，怕民送，滋事，夜逃之。”

黄澜生道：“这就是路子善那东西搞的盟书上的把戏了，列头一名的，就是王护院。闹了个大笑话，所以没有奏出去。”

婉姑掉头问他哥哥：“他念些啥子，我咋不懂呢？”

“诗，我还不大会哩！”

“那我们还是在后头拌姑姑筵儿去，不听他们。”于是两个孩子又跑了。<sup>[4]</sup>

在这段对话中，在楚子材念竹枝词时，孩子们飞跑过来，又因听不懂又跑了。反衬竹枝词语境中保路运动政治经济事件的复杂性，为一般百姓所搞不清楚的。

## 3. 不同人物心态的刻画

他太太也道：“倒是的，成天耳朵里听的都是些乱糟糟的事，也焦人！像以前太平时，过起来，觉得日子都要长些，太阳也要多些。”楚子材念到十二首了：“平地风潮路债生，合同失败万心惊；川民爱国无他意，为怕瓜分抵死争。关外遥闻帅

---

节来，秃儿巧计早安排；远迎献策清溪县，要把川人尽活埋！——当时，周泉解道，直迎至雅州府清溪县。”

黄澜生笑道：“周大人同四川人民结下的仇怨真深啦！一直到现在，还说他迎到清溪县去献计，陷害股东会同志会；十五以后，更成了舆论，随便他咋个辩白，总没有人信他，并且连十五的事，都栽在他头上，说他是主的谋。所以那天城门洞的假告示，也说只拿赵周。我看周法司真危险，至少也要把官弄除脱的。”

他太太道：“还有几首呀，子材？”

“只有一首了。”

“快念！我听完了，还有事情要做哩。”

“愁看蜀地夜漫漫，剥削横施又毒残；都统将军学巡外，满城却是赵家官！……念完了，表婶。”<sup>[5]</sup>

在这段对话中，作为官吏的黄澜生从竹枝词联想到天象与人事，恐慌世道难得清平了。而作为官眷的黄太太心态则是以前的太平日子太阳也要多些。而作为学生的楚子材则关心这一场政治经济事件中的各色人物的政治博弈。在这段对话中，特别通过黄澜生之口，对保路运动中的核心人物周大人周善培进行议论，既表明当时的舆情，也为以后的情节推动又设下了伏笔。

## （二）凸现历史小说的地域文化意义

进入旧版《大波》的成都竹枝词，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形式”，有如下功用。

### 1. 地域方言

成都竹枝词使用成都方言俗语，常令乡人读之倍感亲切，使诗句有生活气息。清代的成都竹枝词作者吴好山曾云：“知我者，其惟俚言乎；笑我者，其惟俚言乎。”<sup>[6]</sup>另外，方言俗语在作为地方性知识，也让成都竹枝词具有明显的“方言俗语融谐趣”<sup>[7]</sup>的地域特色。

### 2. 都市民俗

清代王士禛云：“《竹枝》泛咏风土，《柳枝》专咏杨柳，此其异也。”竹枝歌词体裁，大抵同于七言绝句。大多率性而出，肆口而成，抒发自由情感，描写风土习俗与生活环境；并且充满了蜀人特有幽默特色：风土记实，谐谑百讽。

## （三）凸现历史小说的方志学意义

一代方志学大师章学诚提出“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乃一方全史”。<sup>[8]</sup>被誉为历史小说的“华阳国志”的《大波》（旧版），将成都竹枝词作为推动情节与呈现事件的由头，体现出成都竹枝词在历史小说文本中纪实史事的效用，从而让旧版《大波》具有了方志学意义上的文学修辞。

## （四）域外文学影响下的修辞

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认为：“我们一样的见到小说家是合着观察与实验家二者而成的。他为观察家时，则呈出他所观察的的事实，预备下了出发点，并由此建立一个坚固的场所，使‘人物’可以转动，现象能够发展。嗣后，实验家的任务来了，

---

他去‘组织’实验，换言之，他去各种人物转动于一种特别的史事中，指出事实的连续性，以应合了现象的‘确定说’所要求。”<sup>[9]</sup>自然主义作家“小说的构成就是，在自然中搜集事实，事实搜集来后考察这些事的种种关系，如情况与环境的变动能生多少影响之类，永不离自然的法则。”<sup>[10]</sup>

深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被称为“中国的左拉”的李劫人，在创作《大波》时，亦是受到了“自然主义作家”的影响，进行自己的历史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他本人虽为辛亥成都保路运动的经历者，但是为了《大波》文学创作，他留心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甚至直接寻访当事人做口述材料记述，进而在史事的基础上，让“人物”转动起来，从而呈现出历史的连续性。因此，在《大波》（旧版）中，作者将具有纪实史事意义的成都竹枝词作为修辞，也可以视为著者受域外文学影响所致，在思想方法上有实验主义的实证倾向。

总之，旧版《大波》的史诗性质与世态描写的高度结合，异常突出。对于成都竹枝词的引用，其效用的确可以这样评价：“李劫人的长篇，在结构、人物、语言各方面得力于传统与地域文化知识修养的丰足，及对左拉、莫泊桑的借鉴，但笔法较为琐屑。”<sup>[11]</sup>

## 二、成都竹枝词引起的“笔墨官司”

### （一）事主周善培的“辩解”

1937年，旧版《大波》发表，周善培于次年“乃展转以得”，读后心绪难平。为了辩解，周善培于戊寅五月即1938年，自费出版了《辛亥四川事变之我》“自叙”，认为“但论其记事之涉余者，则舍可徵且存之公牍报章，乃至宣布全省百四十二州县之文字，独引街巷无根修怨之谣言”<sup>[12]</sup>。为了反击李劫人的“贱事实而尊谣言”，“而以正大波若干条附于后”。

所谓“修怨”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春，布政使王人文护理四川总督，调周善培署提法使。适法官养成所已开学，学员少数在成都招考，多数由州县保送，计约一千二百余人。县保送者大半是各州县的士绅土豪，年龄大都在三四十岁以上，多品质卑劣。周善培重加甄别，淘汰千人，退黜者百端毁谤。<sup>[13]</sup>很显然，在周善培看来那些恶毒攻击谩骂性的竹枝词的作者可能是甄别淘汰的人。

建国后，周善培在亦参加过保路运动的张澜催促下，于1956年11月又撰写了《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以尽我两人参加当时争路的责任”。此书在细节上虽与前著略有出入，但同样肯定了自己在四川争路和独立中的关键作用。历史学家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节录该书，并批注道：“一九五七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盖回忆之作，事实稍有误记，且为自己辩解。”<sup>[14]</sup>

总之，周善培批评李劫人“损害我名誉”，敦促其“修改”小说内容。”<sup>[15]</sup>这便是旧版《大波》引起的“笔墨官司”的缘起。

### （二）著者李劫人的观点

建国后李劫人的确“修改”了《大波》，其中“对周秃子的描写”虽不如建国前版本那样“淋漓尽致”，但对周善培的角色定位并未改变。如此，为何新版《大波》仍然要删裁成都竹枝词？

## 三、新版《大波》删裁成都竹枝词的原因

删，还是不删，这是一个关乎一场笔墨官司的问题；删后，又如何修改，这是一个关乎历史与文学的问题。于笔墨官司的

---

问题，李劫人似乎不太怕打一场官司。而于历史与文学的问题，却“经国之大事”。李劫人自1956年始，“全年集中精力重写《大波》”<sup>[16]</sup>。而这之前在1949年建国后，其间社会时局发生巨变。从社会学的视野观察，作者与事主同时转进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新的场域，双方的社会地位与身份都发生种种变化。

### （一）事主与作者的身份与变化

#### 1. 事主身份

##### （1）作为历史人物的事主

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川设通省劝业道。后由在戊戌变法后流亡过日本、具有维新思想的周善培主持经办劝工总局，统筹川省农工商矿诸事。“其时各省提倡工业，川省各属均筹设劝工局，故设此局以资改进，且综核各属劝工之成绩。”<sup>[17]</sup>

##### （2）作为现实人物的事主

1911年秋，周善培离开四川，初侨居上海，后在北京、天津小住。在上海，周善培与卢作孚过往较密，做过民生公司董事。新中国成立后，周善培成为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委员，后又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 （3）事主的社会资本

周善培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异常复杂丰富。仅在民国，周善培的朋友圈就有黎元洪、段祺瑞、孙中山、溥仪、刘湘、孔祥熙等军政领袖，亦有张謇、康有为、梁启超、卢作孚等商界、学界领袖。周善培在民国“与政学系、皖系、奉系、孙系、宗社党、白俄、关东军、四川军阀也都联络过感情，当然不会忽视日益壮大的中共。”<sup>[18]</sup>

#### 2. 著者身份

1949年后，李劫人社会角色已由一位从事过教育、写作与实业的自由知识分子，变为新中国成都政府公职人员。1950年，59岁的李劫人在本年“7月被委任为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二副市长”、1953年“9月被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sup>[19]</sup>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李劫人个人的社会角色的发生了重大转变，进入新政府高级公职人员序列，这在旧中国作家中是较罕见的。从1950年7月到1954年9月，李劫人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所担任的社会职务及相关的事务性工作上的。从1954年9月到1962年12月辞世，李劫人又将很大部分时间进行文学创作<sup>[20]</sup>。

##### （1）作为公职的著者

在新中国始初，著者李劫人的社会角色已成为成都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然而在几年后，李劫人所面临的社会场域愈来愈具有争斗性、历史性与不确定性。在1957年经过了“整风反右”，李劫人受到了政治教育，并曾公开发表个人检讨《我已走到泥坑的边缘》<sup>[21]</sup>、《我要坚决爬出泥坑，转变我的立场》<sup>[22]</sup>。因此可以推断经过思想改造后的李劫人，在新版《大波》的创作中，主动删裁竹枝词是因为在著者作为公职人员的潜意识中不愿意再“惹事生非”了。

作为副市长的李劫人在处理相关周善培的事情上，也是格外小心的。如致吴汉家函，也可以看出这种相当微妙复杂的心理：

汉家局长：

---

昨日在省人委座谈会上，向仙樵先生言，接上海友人信，云：周孝怀先生前寄来“草堂”二字照片，闻已照样模砌墙面；又，周先生新近所写之“草堂别馆”四字，闻已摄有影片。此二者，周先生亟欲亲目一睹。希即日将墙面上已模出之“草堂”二字照一像片，“草堂别馆”四字之照片重洗一张，俱函送向仙樵先生处，俾使转寄上海云云。周孝怀先生年过八旬，汲汲于身后名，此可理解也。盼速为之，以了此老心愿为要。此致

敬礼！

李劫人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sup>[23]</sup>

## （2）作为作家的著者

李劫人曾说：“我对政治学习是用了功的”。实际上《人民日报》《红旗》是李劫人经常必看的报刊，然而他的“思想改造”终究是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进行彻头彻尾改造的。李劫人对于政治学习应当是只吸收自己认为有用的和自己愿意的。

1961年3月23日，李劫人在致刘白羽信中说：“关于创作规划，我原有一种妄想，拟六十年来之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生活，在各阶级、各阶层中之变化。）以历史唯物观点，凭自身经历研究所得，用形象化手法，使其一一反映于文字。”<sup>[24]</sup>这表明，建国后，李劫人已将历史唯物观念作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了。这也是从旧版《大波》以人物为中心，改变为新版《大波》以事件为中心，刻画其中的各阶层人物之日常生活变化最根本的原由所在：观念决定内容，内容决定构思，构思决定形式。自觉地从文学的实证转变到文学的实证与文学辩证相结合的创作，可以视为接受了历史唯物观念的李劫人所进行的新的探索。

此时著者因其面临种种场域的争斗、博弈，著者个人亦从担任公职处理日常公务为主的社会角色，从重新回归作为作家的身份，以文学创作为主了。这时的李劫人最难能可贵之处是，他的文学创作并没有成为“文艺服务政治主题”的工具，让自己笔下塑造为政治服务的“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而是在探索尝试与旧版《大波》不同的重写。探索尝试一种新的“历史书写”，即在还原重大历史事件时，将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来。或者说，以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连续性变化，来进行宏大的历史叙事。

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李劫人在长期、大量的文学创作与翻译中，早已形成了他自己的文学书写“惯习”。无论是李劫人大量阅读与翻译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探析《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还是自1937年创作发表“大河小说”系列以来，无论其文学创作理念，还是其创作实践都在形塑了他个人的“文学惯习”。虽说在建国后，所面临的种种社会场域发生的巨变，由于李劫人的个人人格禀性所在，他的文学创作的史传情结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只是在已有的观念上加载了历史唯物观，并在创作上进行新的尝试与探索。

## （二）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

可以说周善培的回忆为一种自传记忆，可以说它与历史记忆的真实相互渗透，然而它是属于一种个人记忆的。而李劫人作为辛亥成都保路运动的少年学生参与者，又作为反映呈现这场运动的历史小说家，他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观察与记忆，可以说属于他自己那个阶层的集体记忆。因此，对于辛亥成都保路事件的印象与回忆，周善培的自传回忆，必然会与李劫人代表的集体记忆发生矛盾。

由于“历史是一系变化的图像，当然——从它的角度看——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因为它着眼于整体，而几乎每年这个整

---

体的某个地方会发生某些改变。”<sup>[25]</sup>

李劫人在新版《大波》中，删裁了成都竹枝词，也可以说是出于作为“历史整体”的考量的历史记忆的结果。据李劫人的书信记述，在修改《大波》期间，他不但看了周善培的回忆文字，还向历史学家戴执礼借阅了《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的手稿；<sup>[26]</sup>并且查阅了许多相关的史实资料与走访了亲历者。因此，新版《大波》已有意识避免了旧版《大波》引用成都竹枝词而对人物进行漫画式的形象刻画。

新版《大波》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并且与旧版《大波》相比，更加尤其注意历史发生的连续性与日常生活性，从而建构了在描述风格上宏大而细微、并有文学抒情隐喻性的、兼具史诗性与文学诗性新文本。如旧版《大波》的开头，描述成都皮影戏；新版《大波》则是详细描述捆绑拖着木头构造、铁皮包裹的两层仓船的蒸汽机船蜀通轮船，而凸现深刻的历史文化隐喻。<sup>[27]</sup>

### （三）文学人物与现实人物

作为历史人物，周善培具有“事实的真实”，其在成都辛亥保路运动前后表现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且周善培本人也进行了反复的自我辩解。这不能不让李劫人创作新版《大波》不得不考虑。

无论在新旧版《大波》中，一方面，周善培都是作为文学人物，出现在著者的历史小说文本中，塑造人物当然是为了追求“本质的真实”。然而，因为事主作为现实人物，周善培在建国后所处的政治地位与社会时代环境的改变，又使之具有了特殊性。另一方面，由于著者本人作为现实人物，面临社会场域的种种变化并身临各种政治风波。因此，李劫人对于周善培现实的评判与文学的塑造应当说是有双重标准的。在现实的评判中，李劫人可以说保持前后一致的态度；而在文学的塑造中，李劫人在新版《大波》是有所顾虑的，不再具有原来的嘲讽了，而是采取了一种省略回避的写作策略。

### （四）作为历史的时段

《大波》所呈现历史，距离历史事件的发生无疑是一个“超短时段”，故对于人物处理疑惑可能出现评判“盲区”。再则，作为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成都辛亥保路运动，为一场中国社会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巨变；而1949年时局的改变，又标志从近现代走向现代的巨变。因此，在双重巨变下，新版《大波》删裁成都竹枝词，既为一种历史考量，亦为一种现实考量。李劫人在1961年2月6日致黄仲苏信中道：“拙著《大波》一、二两部，不知已否誉及？自谓经数年政治教育，思想学习，反观从前，迥异畴昔，构思落墨，固自不同。”<sup>[28]</sup>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保持历史小说的文学文本性质，其中“对周秃子的描写”虽不如建国前版本那样“淋漓尽致”，但对周善培的角色定位并未改变。不过，新版《大波》删裁了相关周善培所有的成都竹枝词，不能不说是一种折衷的创作手法；换言之，亦可视为著者经过“政治思想改造”后做出的一种牺牲的文学妥协。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李劫人的个人“惯习”所决定，无论新版旧版《大波》，虽在一片众声喧哗中，莫衷一是，然而其文学价值应各有千秋，俱为呈现。

## 四、新版《大波》删裁成都竹枝词后

### （一）删裁成都竹枝词后的通信

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曾说：“‘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典型’指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

---

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的类的样本。因此，在这种或者那种典型和他的许许多多同时代人之间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sup>[29]</sup>

由于李劫人的留法背景，使他笔下的文学人物塑造也认同这样的“典型论”，因此，作为历史小说中的“文学人物周善培”，应当是那一类人物的集合体，而区别于作为历史人物、或现实人物的周善培。

李劫人在与其好友张颐的通信中说：“但《大波》非历史记载，又本文艺必须高于事实原则，只要能概括当日情况，而又未违史迹演变过程，则亦已矣！”<sup>[30]</sup>李劫人毫不掩饰地说：“《大波》第三部挖掘成都假独立之根源，使掩饰五十余年真面目之周秃子，暴其丑恶于光天化日之下，（此人幸而早死一年，否则又将同我大打笔墨官司，或者如王朗之差死，亦在可能之中。）此真正史章也，我翁何不一找？幸有以教我！”<sup>[31]</sup>这表明，在新版《大波》虽说删裁了成都竹枝词，却并没有放弃对于作为“文学人物周善培”的揭露与鞭笞。

## （二）删裁成都竹枝词后的新版《大波》

对于新版《大波》为何要删去成都竹枝词，亦有可能不仅仅只是因为作者本人与周善培的“笔墨官司”相关，应当说更重要的是与作者重写《大波》的种种“想法”相关。

1955年6月，李劫人在《死水微澜·前记》（修订版）中说：“《大波》是专写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四川争路事件。……但这运动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当时参加这运动的人，也往往蔽于它那光怪陆离的外貌，而不容易说明它的本质。我有意要把这一个运动分析综合，形象化地具体写出。但在三部小说中，偏以《大波》写得顶糟。……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sup>[32]</sup>

在新版《大波》构思上这样的考虑：

制台衙门流血……还只算是四川乱事的开始，必到川西坝民众起来了，同志军因利乘势，与赵尔丰的军队不断冲突，使得清朝统治阶级手忙足乱，不能不派遣端方统率一标湖北新军入川，又不能不叫瑞澂多调劲旅到川鄂边布防，以致武昌空虚，革命党人振臂一呼，而于十月十日打出革命第一枪，这才算得“轩然大波”，也才是《大波》的主题。这是一种有关键性的政治运动，它当然要影响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当时的人们的思潮。你写政治上的变革，你能不写生活上、思想上的变革么？你写生活上、思想上的脉动，你又能不写当时政治、经济的脉动么？必须尽力写出时代的全貌，别人也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当时历史的真实。<sup>[33]</sup>

由此可以解析，新版《大波》并不是终不为当时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观念所动，而是尽力探索一种全景式的“历史书写”，书写历史大事件下社会民众与社会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试图让新版《大波》更具有史诗性，或者说更具有史传性。新版《大波》加强了历史性，对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也连续性与情节化了，纠正了旧版的某些史实失误，弥补了一些史实疏漏。如果说旧版《大波》是世情的叙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实证；那么新版《大波》则是以事件为中心的文学实证与文学辩证相结合。作为“大河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版《大波》对于历史重大事件为连续性的呈现，亦为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全景式的呈现，这样的书写方式可视为一种历史小说探索性的新文本。

由于旧版《大波》为世情叙事，而新版《大波》是历史叙事；前者革命为背景，后者革命为场景<sup>[34]</sup>。因此，在新版《大波》中，历史的叙事重于文学的叙事，对于历史人物转化为文学人物更加偏重于接近历史的“真实”，并更加注重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特别以历史人物周善培为例，讨论当其转化为小说中的文学人物时，应有的面目：

例如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中，写周善培这个人及其活动，便感到有些欠缺，虽然也还了他一副本来面目。因为对于

---

辛亥年成都假独立，周善培辄自以为有大功可居，我的确为他表了功，比他自己在一九五六年写的《辛亥四川争路我所亲历之重要事实》，似乎还真实些罢？可惜由于我艺术水平低，不免糟蹋这样题材，要是高手来写，准写能够继承我国古典长篇的优点而发扬光大之的！<sup>[35]</sup>

当周善培从现实人物，转化为历史人物，再转化为文学人物时，作为文学虚构的成份不断增加，而作为纪实的竹枝词的存在意义就有了被删裁的可能。何以此言，这是因为作为历史小说家的李劫人，在面对人物的典型与历史的事件时，一方面要联系着小说的虚构，另一方面则要联系着历史的真实，同时还要考量在现实社会场域存在的种种争斗性与历史性。因此在数难之间，难免有些“琐屑”。新版《大波》删裁那些成都竹枝词就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并且亦是让作者深引为文学“憾事”的一种必然。因此，《大波》重写为了“以赎前愆”，删裁成都竹枝词仅是由头，而著者创作观念的转向才是深层次的内在驱动。

#### 参考文献：

- [1] 林孔翼. 成都竹枝词（修订本）[M].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55.
- [2][3][4][5] 李劫人. 大波（下）（1937年版本）[M].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 365, 366, 367, 368.
- [6] 林孔翼. 成都竹枝词（修订本）[M].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75.
- [7] 谭继和. 竹枝成都[M].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4.
- [8] 中华书局. 文史通义校注（上下册）[M]. 中华书局，1985. 861.
- [9][10] 左拉著，修匀译. 实验小说论[M]. 美的书店，1949. 14, 16.
- [1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47.
- [12] 周善培. 辛亥四川事变之我[A]. 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六辑）[C]. 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 6.
- [13][15] 张海山. 周善培与晚清警察与补述[M]. 文史杂志，2009，（4）.
- [14] 戴执礼编.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全三册）[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69.
- [16][19] 李眉. 李劫人年谱[A]. 严晓琴主编. 李劫人与菱窠[C].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 73, 69.
- [17] 周询. 蜀海丛谈[M]. 巴蜀书社，1986. 139.
- [18] 章立凡. “国号”系铃人周善培[J]. 凤凰周刊，2006，（15）.
- [20] 雷兵. “改行的作家”：市长李劫人角色认同的困窘，1950-1962[J]. 历史研究，2005，（2）.
- [21] 四川日报[N]. 1957-8-30.

- 
- [22] 成都日报 [N] . 1957-9-15.
- [23][24][26][28][30][31] 王嘉陵. 李劫人晚年书信集(增补本) [M] .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49, 224, 47, 231, 236, 235.
- [25] 莫里斯·哈布瓦赫. 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 [A] . 阿斯特莉特·埃尔, 冯亚琳主编.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C]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90.
- [27] 谢天开. 作为“信史”的《大波》与辛亥四川交通近代化 [J] . 中华文化论坛, 2013, (2) .
- [29] 巴尔扎克. 《一桩无头公案》初版序言 [A] .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期) [C]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5. 137.
- [32] 李劫人. 死水微澜前记 [A] . 死水微澜(修订版) [C]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2.
- [33][35] 李劫人. 《大波》第二部书后 [A] . 大波(全三册) [C]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367, 373.
- [34] 张义奇. 革命由背景向场景转换——《大波》的世情叙事与历史叙事 [A] . 李劫人研究 2011 [C]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29.